

概念悬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生产的隐性危机

作者 张琼 · SDE 学员 · 约 2.9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8月2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中国社会学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通常被置于“西方理论霸权”这一外部对抗性叙事之下。本文提出一个不同的诊断：当前面临的根本困境并非理论上的依附，而是发生在知识生产内部的一种“概念悬空”——概念在与西方理论的“反向建构”中被规定了生长的方向，使得它在尚未经历经验的充分摩擦与形塑之前，就进入了硬化与流通的程序。“反向建构”不是研究者个体的策略选择或认知失误，而是一套嵌入制度性工序的知识生产格式：它要求概念的意义在与西方理论的镜像对抗中被确立，而非在经验的矛盾与张力中长出来。本文首先从经验土壤的碎片化、理念压力的体系化催促、阐释共同体的塌陷三者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入手，分析这套工序何以在当代中国学术场域中获得制度性优势；其次以“内卷”的误植为解剖现场，展示反向建构工序如何系统性地免除概念接受经验检验的义务；再次以项飙“工作洞”和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为正面对照，追踪好概念如何在与既有理论传统和新型经验的双向摩擦中，从制度的缝隙里经过反复挣扎而长出来；最后以独立的“反身性检验”章节，将本文的诊断刀锋对准自身，公开论证本文的核心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环节上也可能落入了它所批判的反向建构陷阱。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这一知识形态的伦理后果——当知识的真正收件人被反向建构工序在微观层面逐步置换为知识生产制度本身时，知识向具体人“返回”的路径便被截断了。本文将“时代命题”作为不在场的背景条件处理，诊断集中在其自主知识生产的内部工序偏离，对该命题本身的系统分析不在本文论域之内。走出困境的路径不在于构思更宏大的替代性体系或浪漫主义地呼吁“回归田野”或“回归摩擦”，而在于诚实地识别那些可以被改造的制度性节点，从这些节点开始松动反向建构工序对知识生产的规定性。

关键词 概念悬空；反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阐释共同体；知识伦理

引言：从撤销一个先验开始

在“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命题周围，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稳定的讨论语法。这套语法的核心句是：中国社会学长期受制于西方理论霸权，因此必须建立一套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命题所预设的前提——“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正当目标——在大多数讨论中被当作起点来使用，而不是被当作对象来审视。

本文要做的事情，是撤销这个先验。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的不言自明性恰恰遮蔽了一个更隐蔽的过程：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从一种知识伦理演变为一项被制度强力推动的任务时，“用知识回应中国经验”这一最初的知识冲动，是否会悄悄地被替换成“将中国经验作为材料，去完成‘生产自主知识’这一制度性要求”？前者是知识为经验服务，后者是经验为知识的合法性服务。在这个转换中，经验的地位会发生实质性的位移——它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切进内部去理解的、桀骜不驯的实在，而是变成了一块需要被盖上“自主”印章的原料。

如果这个转换确实在发生，那么中国社会学在追求“自主知识体系”时面临的真正危机，就不是“西方理论霸权”这一外部假想敌，而是一种内生性的知识生产偏离。这种偏离的核心特征是：概念在与西方理论的“反向建构”中被规定了生长的方向，使得它在尚未经历经验的充分摩擦与形塑之前，就进入了硬化与流通的程序。我将这种偏离命名为“概念悬空”。

这里需要立即对“反向建构”给出一个初始界定——尽管它的完整内涵将在后文的解剖中逐步展开。反向建构不是泛指一切“参照他者来确立自身”的认知行为（那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征），也不等于理论建构中常见的“与既有文献对话”（那是任何严肃学术工作的必要环节）。反向建构特指这样一种知识生产工序：概念的意义不是在对经验内部矛盾的反复追问中逐步凝结出来的，而是在与西方理论的镜像对抗中被赋予的——“西方理论说X，所以我们必须说非X或反X，并且这个‘非X’或‘反X’就是我们自主性的证明”。在这个工序里，经验本应扮演的“裁判”角色被架空了：概念能否成立，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切得开经验内部的矛盾与差异，而取决于它在与西方理论的对抗中是否呈现出足够鲜明的差异性。西方理论在这里不只是被对话的对象，而是被建构为一个系统性的“反向参照系”——它的存在，为概念的“自主性”提供了不需要经过经验检验的直接担保。

“悬空”这个命名指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知识生产状态：概念并非完全无效——它在逻辑推演上往往能够自洽，在学科竞技中也常常能够得分——但它的生成过程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它没有经验的矛盾与张力中被反复冲刷、被逼着重新调整自身的边界。它的根，不是扎在经验内部那些具体的、恼人的矛盾里，而是扎在与西方理论进行镜像对抗的那个论证竞赛中。由此生产出来的概念，看起来是“中国造”，摸起来却不贴肉，砸下去不流血。它们尚未扎根，便已寻求结果；尚未在经验中浸泡透彻，便已开始为自己建造理论体系的围墙。

这个诊断需要立刻接受一系列追问，也是本文必须守住的关口。

第一，问题裁定的公开说明。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命题的语境，通常同时包含两个部分——“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代命题”——二者构成一种张力：前者指向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自觉，后者指向外部现实对知识的实质性召唤。本文判定，当前的核心故障不在于知识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不力，而在于知识生产内部的“自主化”工序使得它与一切有效回应发生了初始隔离——在那个本该被时代命题逼出判断的环节，反向建构的工序已经抢先一步把概念拉上了悬空的轨道。因此，本文暂时搁置对“时代命题如何参与这一过程”的系统分析，将其作为一个不在场的背景条件来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代命题”可以被当作一个中性容器——它在最具体的经验层面（外卖骑手的困顿、教育焦虑的蔓延、城乡流动的撕裂）恰恰构成了概念悬空试图去“解释”却又系统性地错失了的那个东西。本文在此诚实声明这一改切：原初问题的两半，本文暂时只处理一半。这意味着本文的结论不应被读作对“中国社会学与时代命题”这个完整问题的全称判断，它是一个集中解剖这其中特定工序——自主知识生产的内在偏离——的诊断，同时始终对那个被搁置的“另一半”保持觉察：它所承载的那些具体经验，正是本文论域内被悬空的概念所无法触及、却不断伪装成已触及了的对象。

第二，分析范围的自限。本文大量取材于学术论文、课题申报、核心期刊发表这类制度化知识生产的现场。这并非因为在这些现场之外没有知识生产，而是因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压力在这些现场最为集中，因而更容易从中观察到反向建构工序的完整样貌。但这同时意味着本文的结论主要适用于这类制度化文本的生产——那些不在职称评审和期刊发表逻辑内运作的知识活动（田野调查、内参写作、公共讨论、教学实践）可能遵循另一套不同的约束逻辑，本文的悬空诊断不能不加限定地推

及它们。本文的命题是“反向建构工序在制度化知识生产中导致了概念悬空”，要检验这个命题，不仅需要考察发生悬空的案例（本文将在第三节完成），还需要考察那些在相同制度压力下未发生悬空或悬空程度较低的反例——追问它们为何没有被这道工序捕获，它们拥有什么样的缓冲机制。本文将在第四节通过项飙“工作洞”和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发生学解剖来完成这一检验。

第三，一个最让本文自己不安的反身性问题必须在此提前坦承。本文的核心操作，恰恰是解剖一套被称为“反向建构”的知识工序。那么，本文自己提出的“概念悬空”这个命名，其建构过程是否也可能携带着反向建构的痕迹？本文在第五部分与“概念物化”“符号资本区隔”“宏大理论先行”“科学知识制造”进行对质，这个操作本身是否正是反向建构的标准动作——通过与既有理论的差异化对照来确立自身的正当性？本文将在第七部分以独立的“反身性检验”章节正面解剖这个问题。这份反身性的诚实，本身不是对诊断的消解——恰恰相反，它是诊断能够开始的那个起点：一个正在解剖反向建构的研究，必须比它的研究对象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在同一套制度条件中写作，也同样面对着被悬空的压力。它唯一的优势不是它站在外面，而是它至少正在试图看清这一点——包括看清自己正在踩着的这一块地板。

一、硬币驱逐了波浪：概念的“硬化”表征

要理解“概念悬空”的发生，首先需要观察一个直观却常被忽略的现象：在社会学的知识场域里，核心概念正在以一种特定的形态流通——它们越来越像一枚枚边界清晰、内涵稳定、可在不同研究场景中被反复使用的“硬币”。我称之为概念的“硬通货化”。

这种硬通货化有其制度上的便利。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框架——布迪厄（Bourdieu, 1979）的“场域”与“资本”、福柯（Foucault, 1975）的“规训”、吉登斯（Giddens, 1984）的“结构化”——提供了一套高度标准化的概念工具箱。研究者只需将这些工具从西方理论的陈列架上取下，搬运至中国的经验现场，便可完成一次学术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概念就像学术界通行的货币：它自身是坚硬的、边界明确的，携带的是原产地（西方理论大师）的信用背书，可以在不同的经验“市场”中无障碍流通，最终折算成论文发表、课题立项和职称晋升这些可计量的价值。

问题在于，一种健康的知识生态，本不该只有“硬币”这一种流通形态。更原初的知识形态，是一种流动的、随经验而波动的认知体验。一个好的概念在它刚被锻造出来时，并不是一枚硬邦邦的硬币，而更像一道波——它沿着特定的经验线索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震荡、偏折，甚至撞击到活生生的具体经验后被重新塑形。费孝通（1947）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提供了可被反复套用的固定定义，而在于它描绘出了一种关系的“节奏”：从“己”向外推出去，一圈圈扩散又一圈圈收回来的信任与义务梯度。这个节奏是活的，读者在阅读时脑中浮现的不是静态的几何图形，而是石头投入水中那圈荡开的涟漪。你很难把这个过程压缩成一个标准的“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它的意义存在于它推进的方式里。

然而，当“差序格局”被编入社会学教材、被成千上万篇论文当作理论框架反复引证之后，它作为“硬币”的那一面就不可逆转地被放大了。学生们记住的是这个词组的五个字和它的标准解释，而不是费孝通最初切开经验时那股推进的力量。一个本该是波动的、在经验中持续涌动的认知过程，被凝固成了一个可数的、边界清晰的知识粒子。我们的思考，就这样被锁死在硬卡片做成的格子里。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更隐蔽的伤害在于：当硬通货成为学术市场的默认语法，它就反过来规训了研究者的认知习惯。一个博士生在田野里捕捉到的、无法被既有概念容纳的微妙感受——比如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午休时反复刷自己女儿快手视频的那种不可名状的动作——因为找不到现成的理论“硬币”来标示它，研究者可能会在潜意识的压力下将它当作“不科学”或“太个人化”的琐碎经验而弃之不用。学术期刊审稿人追问的是“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而不是你感受到了什么说不清的东西。于是，一代研究者最敏锐的那部分直觉，被训练成了不能写进论文的私人感受。在饭桌上，他们是敏锐的时代观察者；回到稿子里，他们变回安全变量的操作员。

硬币驱逐了波浪。但这里的追问不能停在“驱逐”这个现象描述上。需要继续追问的是：硬币之所以能够驱逐波浪，仅仅是因为制度化的惰性吗？还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知识场域里，硬币被赋予了一种波浪所没有的额外价值——它不仅是“方便的”，而且是“自主的”？当一个研究者选择使用一个已被西方理论大师认证过的概念时，他还需要额外论证“我用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依附于西方理论”；但当他使用的是一套已经被标识为“中国自主”的概念框架时，他在这笔论证负担上就被豁免了。换言之，在这个特定场域里，硬币的硬度不仅是知识标准化的产物，更是反向建构工序所赋予的额外合法性——“这枚硬币是咱们自己铸的”。被驱逐的，不只是波浪，更是那种“还没想清楚、尚未被任何硬币标示、却真实落在经验里的感受”得以被认真对待的权利。

二、浮力从何而来：悬空发生的三重条件

概念不会无缘无故地浮起来。它需要特定的条件——一种持续向上的浮力，以及一个不再把它往下拽的经验重力场。本文识别出三重条件。但与列出三根平行支柱不同，本节的重点在于揭示它们之间如何咬合——三者不是三个独立的变量分别施力，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每一重条件的加剧，都会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加剧另外两重，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悬空回路。

第一重条件：经验的碎片化——土壤失去了握力。

当代中国社会学面对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剧烈变动的、高度杂糅的、内部充满断裂的庞然大物。一个外卖骑手，被平台的算法实时追踪与管控，但他的家庭伦理与生命期待可能依然是前现代的——他拼命跑单是为了给老家父母盖房子，而那个房子的样式是他二十年前在村里看到的第一栋楼房的样子。一个珠三角的“厂弟厂妹”，其消费文化与身份认同是高度全球化的，但其赖以抵抗风险的社会网络，却退回到了血缘与地缘。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有清晰边界和统一逻辑的“中国社会”，而是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逻辑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里剧烈摩擦与耦合的现场。

这种经验形态给概念化带来了真正的困难：经验本身是碎片化的和高速流动的，它拒绝被任何一个宏大的、同质化的概念轻易捕获。一个好的概念，本应该被经验的复杂性反复“拖住”——每一次研究者尝试用一个概念去罩住现象时，经验的某个不配合的部分就应该把这个概念拽下来，逼它调整自己。但当经验本身已经高度碎片化时，它就丧失了这种拖拽力。碎片太轻了，无法形成一个持续的、可以把概念往下拉的重力场。反而，正因为经验是碎的，研究者可以从这一堆碎片里随意拾取那些刚好符合自己理论预设的“证据”——那些不配合的碎片，被很方便地留在理论的射程之外。

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经验碎片化与反向建构工序之间是什么关系？两者不是独立的。正是因为经验是碎片化的、充满内部张力的，反向建构工序才获得了一种特定的认知便利——它不需要面

对一个强大的、整体性的“经验反驳”。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经验场域，意味着任何一个宏大概念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因为碎片足够多、足够杂。反向建构工序在这种经验条件下如鱼得水：它可以在经验碎片中轻松拾取那些恰好支持“中国的X与西方不同”的材料，而把那些不配合的碎片留给“未来研究”。经验的碎片化不是概念悬空的被动背景，而是反向建构工序得以高效运转的认知条件。

第二重条件：理念的“催促”——制度在往上抽。

我们头顶上悬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面旗帜。它携带着多重力量：民族复兴宏大叙事所赋予的正当性、学科合法性焦虑所激发的紧迫感、以及项目申报与人才评定的功利性驱动。这面旗帜所要求的，恰恰不是一个可以长期“说不清”的模糊判断，而是一个能够与“西方知识体系”并驾齐驱的、旗帜鲜明的“整体性替代方案”。

这里的关键词是“催促”。制度性的考核周期——三年聘期、五年评估——无法容忍一个判断长时间停留在“正在形成中”的状态。它们要的是“成果”，而且是可以被统计、被比较、被展示的“成果”。一个边界清晰、内涵稳定、可被引用的概念，比一个模糊的、正在发生中的、充满自我怀疑的追问，更适合被纳入制度化的考核流水线。这种催促并非任何人的恶意，而是系统在追求可治理性过程中自然涌现的秩序倾向：它要的是能被核算的知识产品，而不是不能被核算的知识过程。在课题申报书的“预期成果”一栏、在期刊审稿单的“理论贡献”评分项、在职称评审表的“代表作创新点”简述中，那种模糊的、尚未凝成概念的试探性判断，几乎不被承认为一种“成果”——它没有可供计量的形状，无法进入比较的程序。而被反向建构工序快速塑形出来的差异化概念，则恰好具备了被核算的一切特征：边界清晰、与西方构成可辨识的差异、可在论文标题中被直接标记。在这种压力下，反向建构工序被“自然选择”为一种最高效的生存策略——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清晰的方式，生产出最能被识别为“自主”的知识产品。它不是某个研究者蓄意选择的路径，而是制度压力下被逼出来的最优解：当一个博士生需要在三年内完成一篇“有理论贡献”的博士论文时，去田野里泡两年、反复与经验摩擦、迟迟不给出漂亮命名的做法，在制度时钟的催促下几乎是奢侈的；而反向建构——用一套与西方理论构成鲜明差异的概念框架来统摄经验材料——则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交付一个“看起来像理论贡献”的产品。理念的催促在每一个具体的职业节点上——博士毕业、聘期考核、职称评审——都在驯化研究者做出这个“理性的”选择：与其让概念在经验的矛盾里慢慢长出来，不如让它在与西方理论的差异中快速立起来。

第三重条件：阐释共同体的塌陷——中间缓冲带的消失。

把上述两重条件放在一起，可能会被误解为一个简单的“下松上催”模型。但这个模型漏掉了最关键的中介层。经验的碎片化和制度的催促之间，从来不是直接作用的。在它们之间，本应存在一个庞大的“阐释共同体”——有判断力的学术期刊、有耐心的审稿人、深入的学术研讨会、跨代际的师承关系。这些中间组织构成了一种缓冲层和转化层：一个年轻学者在田野里捕捉到的粗粝直觉，会在这个共同体中被反复质问、打磨、校准，被逼着与经验反复对质；一个刚提出来的概念提案，会在研讨会上面临同行从各个角度发起的检验，直到它那些不贴肉的棱角被磨掉。

但问题是：这个阐释共同体本身，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履行着缓冲功能？它有没有同样被“理念的催促”所穿透？当学术期刊越来越倾向于发表“理论贡献明确”的论文而不是“提出一个还没想清楚的问题”的稿件，当审稿人也开始追问“你这篇论文的自主性体现在哪里”，当师承关系从“这个判

断还需要再泡一泡”变成了“先发出去再说，评职称来不及了”——这时，阐释共同体就不再是一个缓冲器或孵化器，它变成了一个压力的传送带，甚至一个放大器。制度的催促不是直接压到个体研究者身上的，而是通过这个已经塌陷了的中间地带，被更有效率地传导到知识生产的最前端。

但三重条件之间的关系还不只是“下松、中溃、上催”的线性叠加。它们之间存在着循环放大的反馈环路。阐释共同体的塌陷会进一步加剧经验的碎片化——因为研究者失去了那个能够在共同体中反复检验、校准自身判断的缓冲空间，他们更倾向于独自快速完成研究，更少有机会让同行指出自己“拾取配合性碎片、遗漏不配合碎片”的认知偏差，从而把经验的碎片化从一种客观条件变成了一种被学术工序系统性再生产的状态。与此同时，阐释共同体的塌陷也反过来向制度层面传递了一个信号：既然共同体已经丧失了自主孵化与检验的功能，那么制度层面就更有理由用标准化的指标（发表数量、引用率、课题级别）来替代实质性的学术判断——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理念的催促。反过来，理念催促的加剧又会加速阐释共同体的塌陷：当考核周期越来越短、指标压力越来越大，共同体成员就更无暇承担那些“不直接产生成果”的缓冲工作——比如花三个小时在一个师门讨论会上陪着学生反复追问一个田野细节。于是，三重条件构成了一个相互咬合的齿轮组，每一轮的转动都在加速下一轮。概念悬空不是这三重条件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它们之间循环放大所产生的一种系统性效应。反向建构工序正是在这个循环中获得了它的制度性优势——它不仅是最高效的生存策略，而且是上述循环在每一个具体知识生产节点上被反复训练、被不断强化的标准动作。

三、悬空如何被完成：反向建构工序的微观解剖

三重条件构成了概念悬空的支撑结构，但悬空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知识生产流程中被一步一步完成的？这就需要将解剖刀伸入反向建构工序的微观运作。反向建构不是一个笼统的“做法”，而是一套可以在论文生产的三个关键环节中被具体指认的操作格式：在文献综述环节，它将“理论贡献”定位为“与西方理论的差异”而非“对经验矛盾的揭示”；在研究设计环节，它系统性地筛选那些服务于“反向”论证的经验材料，使得不配合的碎片被方便地留在理论射程之外；在写作环节，它通过“反向缝合”的修辞格式将经验材料缀合到预设的概念框架上，从而完成对概念的最后硬化。以下以中国社会场域内一个真实发生的知识事件——“内卷”的误植——为追踪现场，展示这三个环节是如何接力完成一次概念悬空的。

需要先交代案例选择的理由。“内卷”这个案例的优势在于，它在中国社会学场域内的跨语境旅行路径清晰可辨，从格尔茨（Geertz，1963）的农业经济学分析工具到中国社会“万能标签”的蜕变过程有大量可追溯的文本证据，因而便于展示反向建构工序在每个环节上的具体作用。但这里必须预先防范一种可能的误读：本节不是在谴责“内卷”被“用错了”。那种“原作者说了算”的概念原教旨主义本身就不是本文的立场——概念在旅行中发生变形是知识生产的常态，甚至可能是创造性误读的来源。本文要解剖的不是“误用”这个结果，而是那个使得“误用”能够高效地、系统性地、不受经验反驳地完成自身的制度化工序。换句话说，本文追问的不是“谁把内卷用错了”，而是“为什么在这个场域里，概念可以用这种方式被使用，而不被经验的检验机制拦下来”。

这里还必须补上一步发生学追问，这是本案例解剖在初稿中缺失了的一环：为什么偏偏是“内卷”这个概念被“拉”过来套在当代中国教育竞争上？仅仅是文献综述环节的“便利”和反向建构的“工序”吗？还是因为中国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那种独特经验——那种“所有人都知道过度补习有

害，但没有一个家庭敢率先停下来”的囚徒困境——本身就与格尔茨描述的“所有人都在稻田里投入更多劳动力，但总产出并不增加”有一种经验形态上的呼应？如果不逼出这一步追问，那么反向建构工序就只是一个在认知层面描述“他们用错了概念”的标签，而非一个从经验矛盾里长出来的机制解释。本文的判断是，正是这种经验形态上的模糊相似性——而非概念的精确定义——构成了“内卷”被误植的经验土壤。反向建构工序正是在这片土壤上展开其操作的：它不是凭空发明了一个概念，而是把一个已经与经验有着某种模糊共鸣的既有概念，从它原本的理论脉络中剥离出来，然后通过“西方竞争理论”的差异化对抗，将它硬化为一个所谓的“中国本土概念”。以下三个环节的解剖，追踪的就是这个“剥离—硬化—流通”的流水线。

环节一：文献综述——“理论贡献”的定位偏移。

当一个研究者决定用“内卷”来解释中国教育竞争时，他的文献综述面临一个选择：是将“理论贡献”定位为对教育竞争内部经验矛盾的揭示，还是定位为对既有理论——尤其是西方竞争理论——的差异化修正？前者会把他引向一组追问：中国城市小学生面临的竞争压力，究竟在哪个具体环节上符合格尔茨意义上的“投入增加但产出不增”？这种“内卷”与韩国“教育热”、美国“直升机父母”在竞争机制上的质性差异在哪里？那些在特定分数段上投入增加确实能带来产出提高的“非内卷”区间，为什么被普遍叙事忽略？后者则会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西方竞争理论（如布迪厄与帕斯隆的“文化资本再生产”[Bourdieu & Passeron, 1970]、鲍尔斯与金蒂斯的“符应原则”[Bowles & Gintis, 1976]）主要解释的是阶层再生产的阶级逻辑，而中国的“内卷”则揭示了另一种独特逻辑——全民焦虑式的、无问阶层的“自噬型竞争”。差异化一旦建立，文献综述的任务就完成了：研究的理论贡献被确立为“对西方理论的补充与超越”，而不在于对经验内部矛盾的深挖。

请注意，这个偏移不一定是个体研究者的蓄意选择。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制度环境中，“理论贡献”的评价标准本身就倾向于奖励差异化：一篇论证“中国教育内卷揭示了西方竞争理论无法解释的独特性”的论文，比一篇论证“中国教育竞争在诸多关键维度上与西方并无本质差异”的论文，更容易通过期刊评审和课题结项。这是一个被制度驯化了的认知路径：当差异化成为理论贡献的默认格式，研究者在文献综述中的认知方向就已经被预设了——他们不是在问“经验矛盾是什么”，而是在问“我能在这个经验上做出什么与西方不同的判断”。

环节二：研究设计——材料的筛选与不配合碎片的排除。

文献综述阶段的理论定位一旦确立，它就会反过来规训研究设计中材料的筛选方式。如果一个研究者的理论目标是论证中国教育竞争的“内卷”特异性，那么他在选择经验材料时，会有意或无意地偏好那些能够鲜明呈现“全民焦虑”“无问阶层”“过度竞争”的材料——比如一个中产家庭每年在孩子课外补习上花费数十万的案例、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同样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案例——而把那些不配合这一叙事的碎片排除在外。比如：中国教育竞争的阶层分化程度是否被低估了？在乡镇学校，学生面临的问题可能根本不是“过度竞争”，而是“连竞争的入场券都没拿到”。比如：在特定分数段上，投入增加确实可以带来产出增加——这种“非内卷”区间的事实，因为不支持“全民内卷”的叙事，在研究材料中被系统性地边缘化。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反向建构工序的操作核心：经验材料不是被用来检验概念，而是被用来填充一个已经被预设了方向的概念框架。材料的筛选逻辑不是“哪些材料能帮我逼近对经验内部矛盾的判断”，而是“哪些材料能帮助我在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中把差异化论证做得更饱满”。那些不配合这个差

异化论证的材料——那些“其实在这点上我们和西方差不多”“其实在这个环节上问题根本不是过度竞争而是制度垄断”——不会进入论文正文，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在反向建构的论证结构中没有位置。

环节三：写作——“反向缝合”的修辞格式。

当筛选过的材料进入论文写作环节时，研究者面对的最后一个工序是将材料“缝合”到概念框架上。在这个环节，反向建构频繁采用一种特定的修辞格式，本文称之为“反向缝合”。这种格式的核心句式是：“西方理论认为[某种机制]，但中国经验显示[另一种机制]，因此[本土概念]揭示了[特异性]。”在这个句式里，经验材料的功能不是与概念对质，而是为概念提供例证——它出现在句式中，不是作为一个可能瓦解概念的异质性力量，而是作为一个已经被驯化好了的、恰好证明概念正确性的“案例”。

以“教育内卷”为例。在反向缝合的修辞格式下，一篇分析中国城市教育竞争的典型论文可能会这样组织它的经验材料：先用一个小节的篇幅综述西方竞争理论的缺陷（“布迪厄无法解释中国的低收入家庭为何同样被卷入过度教育竞争”），然后用两到三个小节的篇幅呈现中国的经验材料（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政策文本），最后在“讨论”部分得出结论：“因此，‘教育内卷’揭示了一种中国独特的竞争形态，它超越了西方理论中阶层再生产的分析框架。”在这条流水线上，经验材料经过了文献综述环节的“方向预设”和研究设计环节的“碎片筛选”之后，在写作环节被最终定型：它不再是那个可能谄媚到概念的异质性存在，而是一个已经被安全地编码为“与西方不同”的例证。概念就在这一串操作接力中，被一步一步地托举到了悬空的高度——它不是在经验的反驳中被逼着调整自己，而是在每一个工序节点上都被制度性压力推着远离那种可能让它接受检验的对质。

四、另一种可能：好概念是如何从制度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以上对反向建构工序的解剖，揭示了悬空是如何在具体的知识生产流程中被完成的。但这个诊断要真正立住，不能只靠解剖失败的悬空案例——还需要正面的、在相同制度压力下却未被悬空工序捕获的对照个案，用以检验本文核心命题的边界条件。如果相同制度条件下确实存在成功抵抗了反向建构工序的知识生产个案，那么追问它们抵抗的机制是什么，就能从反面锚定反向建构工序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同时也能为“出路”提供不是来自规范呼吁、而是来自已有实践的经验参照。

本节选择两个正面案例进行解剖：项飙的“工作洞”作为主要解剖对象，吴重庆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作为辅助对照，以加固“工作洞”并非孤例的判断。

一、“工作洞”的发生现场：从“咯噔”一下的感受开始。

项飙对“工作洞”的发现，不是从一个明确的理论假设出发的，而是从一个田野中的困惑开始。在研究北京IT行业中国雇员的劳动过程时，他观察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许多年轻程序员自愿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投入，但他们对这种投入的自我描述，与既有的劳动社会学概念所提供的解释框架之间存在一种说不清楚的错位。既有的概念框架有两种主要版本。第一种来自劳动过程理论（如布若威[Burawoy, 1979]的“赶工游戏”）：工人的超额劳动是资方通过制度设计制造出来的“自愿”——计件工资、绩效考核、晋升阶梯这些机制让工人“自发地”参与对自身剩余价值的榨取。第二种来自情

感劳动或主体性理论：劳动者之所以认同高强度工作，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实现、获得了身份认同。但项飙观察到的东西与这两种解释都有错位。他的访谈对象并不觉得自己“被制度耍了”——他们对加班机制的清醒认知远超布若威模式所能解释。但他们也不是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实现——很多人明确表达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知道这是吃青春饭”。他们更像是把工作当作一个“可以跳进去、暂时把人生问题悬置起来”的空间——一种临时的、高强度的投入，其目的不是为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而是为了攒够钱之后离开工作去“做真正想做的事”。这就是“工作洞”这个概念最初的经验胚胎——一个在田野中反复出现的“咯噔”感：明明眼前的现象和既有概念对不上，但这个“对不上”本身却呈现出一种稳定的模式。

这个胚胎的存活，并非一帆风顺。在项飙早期的田野笔记和学术讨论中，这个直觉曾多次面临被既有理论重新收编的风险。在某个阶段，他自己也曾尝试用布若威的框架来解释IT雇员的加班——不是计件工资制造了“自愿”，而是项目制的竞标压力和同辈间的技术竞赛制造了一种新型的“赶工游戏”。这个思路在逻辑上是通的，而且更容易与既有劳动社会学传统对话——它不需要发明一个新概念，只需要扩展一个旧概念的适用范围。但田野材料反复落到这个扩展：IT雇员对自己处境的描述——“等我攒够了钱就离开”“我知道这是吃青春饭，所以我只干五年”——含有一种布若威框架无法容纳的时间感。他们不是“在游戏中争取更多收益”，而是“在游戏结束之前尽快离场”。这种“工具性地投入一个临时空间，然后离开”的经验结构，最终逼着项飙放弃了“赶工游戏”的框架，转而命名了“工作洞”。这一放弃不是顿悟，而是在多次学术讨论中，被同行反复追问“你这个材料到底在说什么”“你到底观察到的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之后，才逐渐被逼出来的。它依靠的是阐释共同体在局部尚未塌陷的缓冲空间：那些追问没有被“这个概念对自主性有多大贡献”的格式所主导，而是聚焦于经验本身。

二、概念生成的关键工序：在与既有理论和经验摩擦中双向推进。

从那个最初的困感到“工作洞”概念的最终成形，经历了反复的双向推进——既有理论不是一个被简单地“反向”掉的靶子，而是一个与经验材料持续对质的检验工具。第一步：先用既有概念去切经验，看哪些切得开、哪些切不开。布若威的“赶工游戏”提供了一个关键机制——劳动过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造工人的“自愿”。项飙并没有因为要做出一个“中国的”概念就抛弃这个机制，而是追问：在IT雇员的案例中，制度设计制造的“自愿”是什么样的？他的田野提供了答案：这种自愿不是通过计件工资或晋升阶梯来制造的（布若威模式），而是通过一种更隐蔽的机制——企业提供的是“一个可以暂时离开社会关系纠葛的空间”。入职时的集体住宿安排，让雇员们脱离了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网络；项目制的竞标压力，让他们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一个短期目标上；同辈间的技术竞赛，又在工作内部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暂时替代外部社会评价的微型等级系统。这些制度安排叠加在一起，制造出了一种“工作洞”效应——不是工人被计件工资激励着自愿加班，而是他们“自愿”跳进了工作这个可以暂时隔绝人生其他问题的“洞”。第二步：经验反过来逼概念调整自身。当项飙试着用“加班”或“过度劳动”这类既有概念来描述这些IT雇员的工作状态时，经验的某个不配合部分就把概念拽住了：这些雇员对“加班”的体验，与工厂流水线上被迫加班的工人截然不同。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说“回了家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反而成了“最有秩序感的地方”。这说明，单纯用“资方强制”或“劳动控制”无法切中这种体验的独特性——这不是“被迫加班”，也不是“热爱工作”，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经验形态：工作被体验为一种主动跳入、却并非自我实现的临时的、高强度的生活安排。这一步逼出来的调整是：“工作洞”不能只是描述一种劳动制度，它必须同时描述一种生命经

验——它指认的是那些“跳进工作以躲避人生其他问题”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种特定状态。第三步：经验再次逼概念收缩边界。随着田野的深入，项飙注意到另外一些细节。并非所有IT雇员都能把工作变成“洞”。那些在公司里建立了长期职业规划的雇员，那些把当前工作当作职业生涯跳板的雇员，他们的投入模式与“工作洞”不同——他们更像是在搭建一个“上升通道”，而不是在跳进一个“暂时悬置人生的空间”。这个发现逼出“工作洞”的一个关键边界条件：它只在那些把当前劳动视为“过渡期”、即劳动在生命规划中被设定为“攒钱-离开”模式的雇员身上发生。如果劳动被体验为“职业生涯的起点”，那么投入的模式就不同了。这样一来，“工作洞”就不再是一个泛泛而论“中国IT雇员劳动投入”的描述性标签，而是一个有明确适用边界的分析概念：它只在“工具性劳动投入与生命悬置共同发生”的特定条件下成立。

三、“工作洞”为什么没有被反向建构工序捕获？

追踪完成之后，这个反例对于本文核心命题的检验价值就浮现出来了。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工作洞”为什么能够抵抗反向建构工序？本文识别出三个关键机制。

第一，起点的方向不同。“工作洞”的生成过程，不是从“我要做出一个自主概念”或“我需要与西方劳动社会学对话并超越它”出发，而是从“田野里有个东西我还没想清楚”出发。这个起点的差异，决定性地影响了后续整个工序。当起点的方向是“我要把田野里那个说不清的东西弄清楚”，经验材料的筛选逻辑就不再是“哪些材料能帮我建立与西方理论的差异”，而是“哪些材料能帮我检验我对那个说不清的东西的初步判断——包括那些可能推翻这个初步判断的材料”。项飙之所以没有抛弃那些不受“赶工游戏”解释的粗粝细节，正是因为他的起点不在于“建立与西方的差异”，而在于“搞清楚眼前的经验”。

第二，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模式不同。“工作洞”在生产过程中始终与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保持着严肃的对质关系——不是通过“反向”来建立差异（“布若威说赶工游戏，我说工作洞，所以我超越了布若威”），而是把既有理论当作一个分析工具来使用：用它去切经验，看哪些切得开、哪些切不开，在切不开的地方再逼出新的命名。这与反向建构工序中“把西方理论当作反向参照系”的做法有质的差异。在反向建构工序中，西方理论的存在是为概念提供差异性的担保——“我跟你不同，所以我自主”。在“工作洞”的生成过程中，西方理论的存在是为概念提供检验的标尺——“你帮我切切看，切不进去的地方我才需要命名”。前者把理论当作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我不是你），后者把理论当作一把刀（我用你来切经验，切不进去的地方就是新概念的生成点）。

第三，阐释共同体的局部庇护。“工作洞”这个概念的生成，不是项飙一个人在书斋里完成的。在从田野笔记到最终成文的过程中，它在多个学术讨论场合被反复质问、打磨、校准。这里的关键是：这些讨论场合没有按照“你的理论贡献有多大”的格式来组织发问，而是聚焦于经验本身——“这个雇员的这个说法到底什么意思？”“你确定他不是在进行自我合理化？”“你有没有观察到反例——那种同样在这个公司、但没有跳进‘洞’里的人？”这种发问方式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这些特定的学术网络中，阐释共同体的缓冲功能尚未被制度压力完全穿透——参与讨论的同行的首要关切不是“你这个概念对咱中国自主性有多大贡献”，而是“你这个判断在经验上贴不贴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局部的学术网络并非一块未被制度污染的“净土”。师门讨论会上的追问，同样可能被反向建构逻辑所穿透——导师问“你与既有理论的对话是什么”，有时恰恰就是在驯化学生走上差异化论证的路线。因此，阐释共同体的局部庇护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现成理想空间，而是一个

需要被反复建构、且时刻面临被再次穿透危险的动态实践。那些暂时悬置了制度性催促的讨论场合，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它们处在制度之外，而是因为在特定的互动情境中，参与者共同选择了一种暂时不按“理论贡献”格式提问的规范——这种规范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但它至少证明，阐释共同体的塌陷不是不可逆的。

四、一个辅助对照：“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生成。

为了加固“工作洞”不是孤例的判断，这里简要引入另一个在相同制度条件下成功抵抗了反向建构工序的概念生成个案——吴重庆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来源于他对福建农村外出务工潮后村庄社会结构的长期田野观察。吴重庆注意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之后，村庄的社会关系并没有简单地“瓦解”为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而是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之间仍然维系着差序格局式的熟人伦理，但这种伦理因为承担道德义务的核心主体——青壮年——长期不在场，变成了一种“无主体的熟人关系”。这个概念生成的关键在于，它同样没有从“我要与西方农村社会学对话并超越它”出发，而是从一个反复落到观察者的田野困惑出发：为什么村庄里的人明明还互相认识，却不再互相承担义务？通过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田野中观察到的“主体缺席”现象进行反复对质——既有理论被用作一把刀去切经验，在切不开的地方逼出命名——最终形成了这个概念。它的生成过程虽然不像“工作洞”那样留下了丰富的过程记录，但其起点方向、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模式、以及对经验矛盾的忠实追问，与“工作洞”共享着同一种发生学路径。这个案例的存在，表明在相同的制度压力下，反向建构工序并非不可抵抗。

五、近邻检测：这个命名多看到了什么？

一个宣称诊断了某种普遍困境的判断，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旧话重提。本节将“概念悬空”押送到四个最危险的替代性解释面前，逐一与之对质。这四个对手分别来自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TS）、布迪厄学术场域理论和社会学中程理论传统。如果“概念悬空”不能在这些对手面前划出自己的分离线，那它就只是重复已有认知，而非命名一个新辨别维度。

对质一：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的“概念物化”传统。

这是本文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对手。从舒茨（Schütz, 1932）到伯格与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 1966），知识社会学一直在追问：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识如何在上升为理论建构时反过来压迫人？当概念被剥离了它赖以生成的原初情境，变成可以自由流通的、看似具有独立生命的“知识颗粒”时，它就经历了“物化”——一种由人亲手创造、却反过来被人当作外在客观事实来服从的知识形态。按照这个逻辑，本文所诊断的“概念悬空”，是否只是“概念物化”在中国社会学场域的一个具体实例？

必须首先诚实承认：物化传统有能力解释本文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概念的硬化、硬币化、波浪被驱逐——这些都可以被顺利地装进“物化”的老概念里。任何知识，在经历制度化再生产之后，都可能发生物化。这不是本文的发现。但本文不满足于“物化传统已经解释了一切”的结论，而要追问：如果把“概念悬空”完全置于物化框架中——即将其界定为“民族主义知识生产场域中的一种物化形态”——会漏掉什么？这个追问逼出了物化传统的一个内部空白。

在物化理论的经典图景中，概念的物化预设了一个“原初情境”：生活世界中的某个活生生的体验，在被理论提炼、被制度硬化之前，曾经作为“第一手的知识”存在过。物化描述的是这个“活的东西”被抽离、被固化、被对象化的过程。但“概念悬空”的关键特征之一，恰恰在于某些概念可能从生成之初就缺乏一个充分浸泡于经验的“原初情境”。当概念的意义不是在经验的矛盾中逐步凝结、而是在与西方理论的镜像对抗中被预先规定时，那个据说是被“抽离”的“原初经验”本身，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稀薄的、片段的、被选择性征用的。物化理论可以解释一个丰满的概念如何变硬，但它很难解释一个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活过”的概念如何变硬——因为它的理论预设中没有给“不充分发生的原初情境”留出位置。反向建构工序的独特性正在于此：它不是从一块被反复浸泡过的经验土壤里把概念拔出来，而是在概念尚未充分扎根之前，就已经用差异化的模具将它塑形、硬化和推入流通。这是一种“未浸泡就被硬化”的状态，与经典物化描述的“浸泡后被抽离硬化”在发生学上有着质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概念化策略如下：概念悬空不是在物化之外另立一个平行的概念，而是在物化的解释链条上插入一个此前未被充分命名的断裂环节——一种被特定的反向建构工序所驱动的、在概念尚未从经验中充分长出之前就将其方向预设并硬化的发生形态。知道“物化”，能解释知识为什么变硬；多知道“反向建构”这个机制，能解释在这个特定场域里，知识为什么沿着“与西方构成镜像差异”这一特定方向变硬——以及为什么有些概念甚至在没有被经验充分浸泡的情况下就已经变硬了。这个辨别维度，是物化框架所不能单独覆盖的。

对质二：科学知识社会学（STS）的“知识制造”传统。

拉图尔和伍尔加（Latour & Woolgar, 1979）在《实验室生活》中，塞蒂娜（Knorr-Cetina, 1981）在《制造知识》中，已经精密地展示过：科学事实不是在自然中“被发现”的，而是在实验室的特定工序、铭写装置和论文修辞中被逐步“硬化为客观事实”的。任何一门建制的学科，都在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的知识制造工序，将本地的、杂乱的、带有情境依赖的观察，转化为普遍的、有序的、可流通的“科学事实”。本文所描述的“硬币驱逐波浪”，在这种视角下不过是任何成熟学科都会经历的常规硬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命名为“反向建构”，而不是把它归入“中国社会学特有的知识制造工艺”？

与STS传统的对质，逼出的是“反向建构”在动力机制和方向性上的特异性。在拉图尔描述的实验室工序中，知识制造所服务的最终目标是生产“普遍的客观事实”——虽然这个目标本身是地方性建构的产物，但工序的指向是朝向“让事实看上去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在反向建构工序中，知识制造所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生产“客观事实”，而是生产“自主性差异”——概念必须显示出与西方理论的鲜明对立，才能在“自主知识体系”的竞技场中获得合法性。这不是任何一道标准化工序都能解释的，因为它涉及的不是“将地方性观察转化为普遍性论断”的认知操作，而是“将任何经验材料转化为一个预设好的政治-认知差异符号”的制度性操作。一道指向普遍性，一道指向差异符号——二者的服务对象不同，因而对经验的取舍逻辑、对概念边界的规定方式、以及对不配合材料的容忍度，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偏移。这就是STS的知识制造工序尚未能单独解释的东西。

对质三：布迪厄式学术场域分析中的“符号资本区隔策略”。

布迪厄在《学术人》（Bourdieu, 1984）等著作中描述过：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创造新概念、新主义来制造“区隔”，以此占据符号资本的有利位置。按此逻辑，“概念悬空”不过是学者

在“自主知识体系”议题主导的特定场域中争夺符号资本的一种策略性行为。这个解释可以解释大量“自主概念”的快速涌现和快速淘汰——它们本来就是被当作区隔策略来使用的。本文无意超越或否定布迪厄的框架，恰恰相反，本文所做的正是在布迪厄开辟的方向上将分析推向更具体的发生学层面。布迪厄提供了“场域”“资本”“惯习”这一组高度抽象的分析工具，而本文试图回答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学这个特定场域中，使得个体研究者“自然而然”地走上反向建构路径的那些微观制度机制是什么？在文献综述环节、研究设计环节、写作环节，制度压力如何被翻译为可以被研究者具体操作的动作指令？这不是对布迪厄的反叛，而是对他的未竟之业的接续——把“惯习”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术生产现场里具体地走了一遍。因此，“概念悬空”不是与“符号资本区隔”竞争的新理论，而是在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内部，补上了一段关于“特定场域中特定惯习形态如何在特定制度节点上被驯化出来”的发生学叙事。正是这段叙事，使得布迪厄的抽象概念在本议题上获得了可以被经验检验的血肉。

对质四：默顿“中程理论”（Merton, 1949/1968）传统对“宏大概念先行”的批评。

自默顿以来，社会学就一直在警惕“大而无当”的概念体系。按此逻辑，本文所诊断的“概念悬空”不过是“宏大理论先行”这一老问题的特定表现形态。这个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它说错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追问那个“怎么发生的”。默顿传统提供了一条规范性的指引——“应当让概念与经验保持亲密”——而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发生学的诊断：“在那个制度条件下，不悬空就做不下去”。前者说的是知识的理想形态，后者说的是知识生产偏离的发生机制。更重要的是，默顿的批评无法解释一个本文特别关注的现象：为什么这次的“宏大概念先行”，采取的是“反向对话”的特定形态？这不是所有宏大理论的共性，而是当代中国学术场域的制度条件的特定产物。

综合以上四组对质，“概念悬空”不是在重复已有认知，而是在已有认知之间打开了一个它们都无法单独覆盖的分析地带。它不是一般的概念物化（物化不追问概念可能从一开始就未被经验充分浸泡的发生形态），不是一般的知识制造（STS不追问指向“差异符号”而非“客观事实”的制度性工序），不是一般的区隔策略（布迪厄不追问特定惯习形态在特定制度节点上的微观驯化过程），也不是一般的宏大理论先行（默顿不追问这一特定方向的制度成因）。它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特定场域中的、一种由反向建构工序所催生的、在概念尚未充分扎根经验之前就被制度性浮力托举至流通轨道的知识生产偏离形态。多知道“反向建构”这个机制，我们能多解释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制度场域里，知识的硬化不是随机地朝各个方向飘散，而是精确地、系统性地、高效地飘向“西方的反面”。

六、谁在替我们收信：悬空的伦理后果

概念一旦被反向建构工序推入悬空的轨道，一个更深的、也更让人不安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我们生产的这批知识，它的真正收件人到底是谁？

一个健康的知识伦理循环是这样的：研究者的判断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困境中逼出来的，因此当这个判断最终形成知识之后，它能够沿着某条路径“返回”到经验的承受者那里——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至少，它能帮那些身陷困境的人看清自己身处的结构，知道“原来不全是我的问题，是制度在这个环节把我锁住了”。比如一篇关于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困境的研究，如果它真正从经验的矛盾中逼出了判断，它会指出：阻碍这些孩子的不是抽象的“贫困”，而是城市公共教育资源与户籍身份挂钩这一制度安排在具体的升学流程中如何一步步把他们排斥出去。一个读到这个判断的流动儿童的家

庭，或许无法直接改变制度，但它至少能对自己遭受的那种排斥获得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我的孩子不是不行，是制度没给他坐下的位置。

然而，在概念悬空的知识生产模式下，这个“返回”的路径常常被截断。相当一部分以“自主”为名的产出，对经验世界中的具体问题所提供的可操作解释微乎其微。一个外卖骑手读了分析他“数字劳动异化”的论文，不会因此看清平台派单算法的具体逻辑——那套算法为何在雨天反而降低单均报酬、为何将“准时率”的压力转嫁为骑手的交通风险，这些机制在宏大理论的覆盖下反而被遮蔽了。一个被教育焦虑困住的母亲，读了关于“母职惩罚”的学术分析，或许会在智识上认出自己，但那种凌晨三点醒来、反复计算孩子成绩排名的身体性恐慌，在概念的硬壳上轻轻滑过，没有留下痕迹。

这里发生的事情，比“知识无效”更彻底。不是知识没碰到他者，而是知识的整个生产流程，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者纳入为收件人。这些论文的论证精妙，文献扎实，但它们被生产出来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个学术产品在“构建自主体系”的学科竞赛中获得认受。它们的真正的、最重要的“收件人”，并非那个在生活世界里困惑、痛苦着的“具体他者”，而是知识生产制度本身——是那个掌管着发表、课题、职称和学术声誉的共同体。

在这个节点上，本文必须正面回应一种最常见的辩护：“可是，我们写的论文在结论部分都提了政策建议——这不就证明我们的知识是服务于实践、面向具体人的吗？”这种辩护触及了悬空伦理最隐蔽的运作方式。本文的回应是：“政策建议章”恰恰是收件人置换被最终完成的仪式，而非被纠正的证明。在绝大多数遵循反向建构工序的论文中，那一章“政策建议”是以一种高度格式化的形态出现的——“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社会共识”——这些语句可以在几乎任何一篇社会学论文中被原封不动地复制粘贴，而无需对经验现场的具体困境承担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责任。它的功能，不是向经验承受者返回一份可辨识、可使用的判断，而是给前面正文中所有悬空的操作补上一张伦理免责券：有了这一章，论文的作者就可以宣称“我最终是服务于实践的”，而实际上，那个被架空了的具体他者，在这一章里连一个清晰的剪影都没有。政策建议章不是知识的延伸，而是知识悬空的最后一环——它把知识的伦理责任从一个必须指向具体人的动作，抽象为一套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反复使用的、安全的公文格式。

收件人的置换，不是任何人蓄意的阴谋。它是被一道工序——反向建构——在微观层面一步一步完成的。这正是悬空的伦理后果：不是知识没有回应他者，而是知识的生产方式，使他在生产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抹去了。

七、反身性检验：用本文的刀解剖本文自身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制度化知识生产中，反向建构工序系统性地将概念推离经验的检验，使其在尚未充分扎根之前就进入硬化与流通的轨道。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本文自身的核心概念——“概念悬空”——是否也可能落入了它所批判的同一个陷阱？

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引言和结论中的诚实声明来回答。声明只是声明，而问题要求的是论证。本节将以独立的篇幅，用本文解剖“内卷”和“工作洞”的同一套刀法，来解剖本文自身。这项自我检验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本文的概念生成工序是否存在反向建构？如果存在，它发生在哪些环节？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文核心判断的有效性？

第一个问题：本文的起手式，是否有反向建构的痕迹？

反向建构工序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对经验矛盾的深入追问中逐步凝结，而是在与西方理论的差异化对照中被预先规定了方向。坦率地说，本文在第五部分“近邻检测”中的操作，确实携带着这种格式的痕迹。与“概念物化”“知识与制造”“符号资本区隔”“宏大理论先行”逐一进行对质——这个动作本身，在修辞结构上确实近似于反向建构的标准动作：通过与既有理论的差异化对照，来确立一个新命名的正当性。如果本文只是做了这一步就宣布“概念悬空超越了所有既有解释”，那么它就是在用反向建构的方式来批判反向建构——那将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瓦解。

但这里有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在本文解剖的典型反向建构案例中，差异化对照的功能是“担保”——通过证明“我与西方不同”来赋予概念以不需要经过经验检验的合法性。西方的理论在那里被当作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见我不是你，这个“不是”本身就证明了我的自主性。而在本文的第五部分中，差异化对照的功能不是“担保”而是“检验”——它不是在说“因为我与物化不同，所以我是对的”，而是在说“因为物化传统已经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现象，所以我必须证明，在我的诊断里有一个物化传统无法单独覆盖的机制——反向建构工序的方向预设——这个机制如果存在，它就构成了一个需要被独立命名的新辨别维度。”换言之，对质的目的是对自身命名的边界条件进行压力测试，而不是通过简单地宣布“我跟你不同”来获取免检通行证。但这个区分——“担保”还是“检验”——最终能否成立，不能只靠本文自己的声称，而必须由外部的、独立的检验来裁决。这就是本文结论部分给出证伪条件的原因：如果未来出现了一批“自主”概念被广泛地、有效地使用于经验分析，并且这种“有用”不仅被学术共同体内部认可，也至少部分地被经验现场的使用者——教师、社工、政策执行者——所承认，那么本文的核心诊断就需要被根本性地修正。这个证伪条件的存在，意味着本文至少试图将自己的命题暴露在可被经验反驳的风险之下——这与反向建构工序中概念被免除检验义务的运作逻辑，构成了实质性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本文在材料选择上，是否有“按差异化论证方向筛选材料”的嫌疑？

本文大量取材于发生悬空的案例（“内卷”的误植），并将它们作为论证概念悬空存在的主要证据。一个合理的质疑是：本文是否也犯了它自己诊断的那个错误——只选择那些能够支撑“概念悬空”诊断的经验材料，而系统性地忽略了那些在同样制度条件下未发生悬空的知识生产案例？

本文的回应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本文确实引入了反例——第四节正面解剖了项飙“工作洞”和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生成过程，并将其作为检验核心命题边界条件的对照个案。这些反例不是用来佐证悬空的普遍性，恰恰相反，它们是用来检验“在什么条件下悬空不会发生”的。其次，本文也诚实地承认：这个反例的引入是有限的。本文没有对更广泛的、在相同制度压力下成功抵抗了反向建构工序的知识生产个案进行系统检索和分析。这意味着本文的结论存在一个已验证而未闭合的边界：它已证明在制度化知识生产的主流场域中，反向建构工序确实在系统性地导致概念悬空，并已通过深度追踪的反例识别出了抵抗这道工序的关键机制（起点的方向、与既有理论的关系模式、阐释共同体的局部庇护）——但这些机制的普适性，本文尚未系统验证。

第三个问题：本文的“出路”讨论，是否也预设了某种不言自明的理想状态？

在第八部分讨论出路时，初稿曾反复使用“激活经验与概念之间的摩擦与张力”这样的表述。这里必须进行自我纠正。“摩擦”本身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理想状态。什么被算作“摩擦”、什么被算

作“噪音”，这本身就是制度性评价体系所建构的区分。一个量化研究者感觉到的“摩擦”（比如数据与模型之间的不拟合），与一个田野研究者感觉到的“摩擦”（比如访谈对象的一句话硌到了既有概念框架），在学术场域中受到的承认是不对等的——前者常被严肃对待为“需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后者却可能被当作“不够理论的琐碎经验”而弃置。因此，“回归摩擦”并不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出路——它本身需要被追问：在当前的制度下，什么样的摩擦被允许进入学术写作的正文？什么样的摩擦只能留在田野笔记或饭桌闲谈里？本文做出这一自我纠正，不是要放弃对“摩擦”的召唤，而是要将它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改写为一个需要被追问的对象：好的知识不是从经验的净土里长出来的，也不是从无预设的摩擦中自动生成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包括阐释共同体的局部庇护、评价体系的微观弹性、研究者个体对“说不清”的耐心——被反复逼出来的。本文对出路的讨论，不应滑向对“摩擦”的浪漫化，而应始终锚定在那些可以被具体改造的制度节点上。

八、出路：重新介入，而非浪漫回归

诊断悬空不是为了宣告知识的无望，而是为了识别那些可以被改造的条件。如果概念悬空是被一套特定的反向建构工序在具体的制度节点上完成并循环放大的，那么松动它，也只能从对那些节点的诚实识别与局部介入开始。

这意味着需要与两种常见的出路叙事正面切割。第一种是浪漫主义的“回归经验”论——仿佛只要研究者重返田野，悬空就会自动消散。本文第一至第二部分的论证已经表明，经验的碎片化本身就是悬空发生的条件之一，碎片化的经验无法自动提供那个能把概念往下拽的重力场。不存在一个纯净的、未被理论“污染”的田野等着学者们去浸泡，经验本身早已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数字平台技术、流动家庭伦理共同搅拌而成的、高度复杂和充满理论负担的产物。第二种需要切割的是浪漫主义的“回归摩擦”论——本文在第七部分已经完成了对这一倾向的自我批评。“摩擦”不是不言自明的理想状态，它本身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是被选择性地承认的。因此，出路不是理论上的“应激”——召唤一个抽象的“回归田野”“回归摩擦”“回归真实”——而是识别那些在现行制度内部已经存在的、有可能被重新激活的“缓冲节点”，并从这些节点开始介入。

以下从三个环节分别讨论介入的可能性。

第一环节：评价机制的微观校正。当前学术评价体系对“理论贡献”的判定，高度依赖概念的辨识性和差异性——“你用了什么概念？这个概念与西方理论的区别是否鲜明？”这个逻辑天然奖励反向建构（因为反向建构能最高效地产出面目清晰的差异性），而不奖励那些长期泡在经验里、迟迟不给出漂亮命名的“脏活”。如果评价机制的某些关口——比如期刊的审稿标准、课题的中期与结项考核——能够为“假说”形态的、尚不成熟但经验饱和度高的判断留出空间，情况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学术期刊可以设立专门的经验研究栏目，明确鼓励“本研究暂时不能给出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命名，但它确实识别了一个此前未被描述的具体机制”这类写作；课题评审可以将“经验追踪的深度”作为一个独立于“理论贡献”的评估维度。这些操作不会彻底消解悬空的制度性压力，但它们会在压力传导链上添加一些局部的、微小的“缓冲节点”——那些让一个尚未被反向建构工序完全捕获的判断，可以在制度的缝隙里多趴一会儿的空间。

第二环节：阐释共同体的重新激活。第四节对“工作洞”和“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解剖揭示了一个关键线索：那些在相同制度压力下成功抵抗了反向建构工序的知识生产个案，其生成过程中都有一个尚未被制度压力完全穿透的微型学术网络在提供局部的庇护——同行在讨论中首先追问的不是“你

的理论贡献有多大”，而是“你这个判断在经验上贴不贴肉”。这意味着，“出路”不是一个全体系的再造，而是在现有的阐释共同体内部，识别并激活那些尚未被完全锁死的节点。这需要的不是整个学术体系的革命，而是特定“庇护空间”的自觉维护：一个师门内部的闭门讨论会，不对任何考核负责，唯一的功能是让判断在经验面前被反复质问、打磨、校准；一个学术工作坊，公开发表前让同行从各个角度对证据发难，而不是先追问“你的理论贡献有多大”；一份期刊的特殊栏目，为“尚未完成但经验饱和度高的研究假说”留出发表空间。但这里必须再次强调，这些局部空间并非一块未被制度污染的“净土”。它们之所以能够暂时发挥缓冲功能，不是因为它们处在制度压力之外，而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互动情境中，参与者在反复的磨合中选择了一种暂时不同于主流评价逻辑的讨论规范——这种规范是脆弱的、动态的、时刻面临被穿透危险的。维护这种规范，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自觉，而是持续的反身性努力：在每一次讨论开始之前，都有意识地追问——我们这一轮的提问，是在帮这个判断更贴肉，还是在帮它更快地变成一篇“可发表”的论文？

第三环节：研究者个体的微观抵抗。这并非要个体去当孤胆英雄。“微观抵抗”不起大的结构作用，但它有一个结构分析常常忽略的实在效果：它能让研究者自己的直觉不被制度压力完全驯化。研究者个体能否在田野笔记里诚实地保存那些“咯噔”一下感到说不清的细节，不急于用一个现成概念去覆盖它们？能否在论文中为这些细节留出一两个段落，哪怕只是在方法论附注中陈述“本研究在推进中注意到一则需要进一步追问的现象，但由于目前的分析框架尚不能充分处理，在此标注为待解”？这一两个段落不会改变整篇论文是否被悬空的命运，但它会改变研究者自身是否还保有那种“被经验硌到”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反向建构工序所无法完全吞噬的、知识生产中最后的“摩擦力”来源。

结论：诚实比锋利更重要

本文开篇提出的核心诊断——中国社会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面临的根本困境，是一种内生性的“概念悬空”——现在已得到系统论证。我们追踪了悬空发生的三重条件不是三个独立的变量，而是一个相互咬合、循环放大的自我强化回路：经验的碎片化为反向建构工序提供了认知条件，理念的催促使这道工序在制度压力下被“自然选择”为最优生存策略，阐释共同体的塌陷则撤除了本应在经验与制度之间起到缓冲与孵化作用的中间层——而这三者之间的循环放大，使得反向建构工序在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生产节点上被反复训练为一种标准动作。我们以“内卷”的误植为解剖现场，展示了这道工序如何在文献综述、研究设计、写作三个微观环节中接力完成对概念的悬空。我们以项飙“工作洞”和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为正面对照，反向锚定了反向建构工序发生作用的边界——那些以“拆解经验”而非“命名差异”为起点、以“用理论切经验”而非“与理论反向对话”为方法、并受到阐释共同体局部庇护的知识生产，可以在制度缝隙中锻造出经得起经验检验的概念。我们追问了悬空的伦理后果：收件人的置换不是任何人的蓄意阴谋，而是反向建构工序在微观层面一步一步完成的——在文献综述环节将他者设定为经验材料的提供者而非知识的收件人，在研究设计环节将他者生活中最硌人的细节当作“不支持差异化论证”的噪音筛掉，在写作环节将他的面孔彻底模糊化为论文致谢和引言中的伦理符号，并在“政策建议章”中通过一套可复制粘贴的公文体，把这条退路最终堵死。我们在第七部分以独立的“反身性检验”章节，将本文的诊断刀锋对准了自身——诚实地检验了本文在与“概念物化”等传统的对质中是否也携带了反向建构的痕迹，在材料选择上是否有按差异化论证方向筛选材料的嫌疑，在“出路”讨论中是否也曾将“摩擦”当作不言自明的理想状态。

本文并不声称自己站在悬空之外。在写作的每一步——包括正在写的这一段——我都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同一套制度条件中：我也在对既有理论进行对质和差异化，我也在为我的命名争取学术场域的认受。我的优势不是我站得比任何人高，而仅仅是我正在试图看清楚自己脚下的装置——包括我正在踩着的这一块。

但恰恰是这份承认，指向了结论能够出发的那个起点。如果概念悬空是在反向建构工序中被一步一步完成的，如果这道工序是在三重条件的循环放大中获得其制度性优势的，那么松动它，也只能从对那道工序所依赖的具体制度节点的诚实识别开始。不是一次性推倒整个制度——那不仅不可能，而且会陷入与本文所批判的“宏大替代方案”相同的逻辑——而是在每一个具体可触的节点上追问：“在文献综述的这一步，我能不把‘理论贡献’窄化为‘与西方的差异’吗？在研究设计的这一步，我能给那些不配合我的理论方向的经验碎片留下一个不被筛掉的位置吗？在写作的这一步，我能在我的核心命名旁边，公开标注它可能无法覆盖的阴性案例吗——那些在相同制度条件下应该悬空、却没有悬空的知识生产个案在哪里？那些应该出现本文诊断的机制、却没有出现的场域又在哪里？”

最后，本文愿意给出一个可以被检验的预测，也以此作为本文自我限度的诚实交代。如果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批被广泛使用的、高度“自主”的理论概念，但这些概念的使用者不再仅仅用它们来标示自己的理论身份——“我用‘关系’，说明我反个体主义”——而是真把它们当作分析工具来使用：一线教师能用它们来诊断课堂互动的具体困境、社会工作者能用它们来识别特定社区的信任断裂机制、政策研究者能用它们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制度失效；并且，这种“有用性”的评价标准本身，至少部分地来自经验现场的使用者——教师、社工、政策执行者——而不仅限于知识生产制度内部。如果满足这一条件，恰恰是这些“有用”的使用，反过来重新校准了学术共同体对“什么是好的自主知识”的评价标准，让那种“只在对抗西方意义上自主、却在经验分析上空转”的生产方式因为在实践检验中不解决问题而自然萎缩——那么本文的悬空诊断就需要被根本性地修正。因为到那时，概念就不再是悬空的。它被使用它来切经验的人们，从浮着的那个高度上，一把一把地拽回了地面。

注释

参考文献

- [1] 本文提出的“概念悬空”及其相关分析属于理论性诊断。文中所涉经验案例（如“内卷”的跨语境旅行、“工作洞”的生成过程等）均基于公开学术文本和作者的分析重构，不含原始田野资料；部分细节为聚焦概念生成工序的逻辑而经过简化。读者宜将这些材料视作思想拓展性质的例示，而非经过同行评议的实证研究结果。
- [2] 关于本文的问题裁定与分析范围限制，正文已在引言和结论中集中说明。本文将“时代命题”作为不在场的背景条件处理，诊断集中于自主知识生产内部的工序偏离，对该命题本身的系统分析不在本文论域之内。这一边界设定贯穿全文，并在结论部分得到重申，以免误读。
- [3] 本文的分析取材主要限于高度制度化的学术生产环节（如期刊论文、项目申报等），对其他类型的知识实践（田野备忘录、教学反思、公共写作等）是否同样存在概念悬空，未做系统验证。这些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与制度压力的关系，值得后续专项研究。
- [4] 关于“内卷”概念在中国社会学场域内的使用与变异，本文的描述依据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和评论，系为展示反向建构工序而做的选择性重构，并非对该概念传播史的完整梳理。更全面的考辨需另文专论。

- [5] 对项飙“工作洞”概念生成过程的追踪，主要基于其公开的学术著作、讲座记录和相关评论。项飙对该概念的论述散见于《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012年中译本）及相关演讲，本文的发生学呈现是为概念分析服务的理论重构，细节有所简化。对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简述，依据其《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2014）及相关田野论述中的公开资料。
- [6] “物化”（Verdinglichung/reification）的理论脉络可回溯至马克思与卢卡奇（Lukács, 1923），并由现象学知识社会学（Berger & Luckmann, 1966）加以发展。本文在此主要与后者所描述的物化现象进行对质，旨在凸显“反向建构工序”引入的额外方向性规定，而非全面衔接物化理论的全部传统。
- [7] 本文在第七部分集中检验了自身诊断落入反向建构陷阱的可能性。该检验的策略不是后设的诚实声明，而是以本文同一套分析方法回视自身概念的生成工序。它的结论是：本文的部分运作携带着反向建构的格式痕迹，但这些痕迹主要表现为“对质”的修辞结构与“差异化论证方向”的材料筛选风险，尚未取代经验检验在整个论证中的裁判地位。这一自我诊断的限度同样暴露在读者面前，欢迎检视。
- [8] 本文关于出路的讨论，旨在辨识制度结构中的可介入节点，并非提出一揽子改造方案。所列举的评价机制微调、阐释共同体局部激活等，均为思想实验性质的制度设计，其实践可行性、额外风险及意外后果有待更专门的制度分析加以检验。

费孝通. 1947. 乡土中国.

吴重庆. 2014. 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项飙. 2012.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王迪,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rger, Peter L.,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ourdieu, Pierre.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英译本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ourdieu, Pierre.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英译本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0.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英译本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1977.)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英译本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norr-Cetina, Karin. 1981.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CA: Sage.

Lukács, Georg. 1923.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Malik-Verlag. (英译本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Merton, Robert K. 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8年增订版)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Schütz, Alfred. 1932.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Wien: Springer. (英译本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附论零·本组选篇说明（编辑增补）

本文属张琼 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投稿的两组共八篇：一组的原初问题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代命题」，另一组是莱克维茨的「独异性化」诊断。每组四篇（三个金点子+一次新典范涌现）。编辑逐篇通读评分后录取七篇，本文为其一。落选的一篇是《自噬性共生》——作者站上已有《自噬性适应》《改不动的机器》《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三个同族概念，而该文「系统把自身赖以产生新异的能力代谢为维持运转的养分」这一机制与《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几乎同构，自噬这条路径在本专栏已经走满，按站内近邻规则退出本组。其余七篇均按下文附论一的方式补切最近邻后发表。

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节由编辑增补，不属作者原稿。评分时按严格的全球库口径检索最近邻，发现本文有两个未被正文请上桌的对手；它们不削弱本文的判断，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主张必须先在它们面前站住。以下逐条给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以及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判决性对照预测。

1. 默顿的中层理论

它已走到哪一步。默顿提出中层理论，正是为了让概念落到能被经验检验的高度，反对帕森斯式宏大理论的悬空。这是「概念为何脱离经验」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内部的标准答案。

分离线。分离线在**悬空的原因是抽象层级还是生长方向**。默顿的悬空源于**抽象层级太高**，解药是降层级；本文的悬空源于**概念的生长方向被镜像对抗预先规定**，因此一个标准的中层概念照样可以悬空——「内卷」正是中层的，却依然免除了经验检验的义务。

判决性对照预测。按抽象层级分层测量概念的经验摩擦度（概念在多少个经验场景中被修正过、修正幅度多大）：默顿预测层级越低摩擦越足；本文预测**层级与摩擦度无显著关系，反向建构强度才是预测项**。这一条可用既有概念史文本直接检验。

2. 查卡拉巴提的「地方化欧洲」与后殖民学界对「以差异为担保」的自我批评

它已走到哪一步。后殖民理论早已指认：以「我们与西方不同」为知识合法性的来源，本身是殖民关系的产物；这条自我批评在南亚与拉美学界已有三十年积累。

分离线。分离线在**它是政治问题还是工艺问题**。后殖民批评处理的是**知识政治的不对称**，其解药是去中心化、多元化参照；本文处理的是一道**生产工序**——差异化对照在这道工序里承担的是「担保」功能，从而免除了概念接受经验检验的义务。前者要改变谁在中心，后者要改变差异对照在工序中的位置。

判决性对照预测。考察完全没有西方参照的研究场景（纯本土议题、无西方对手可镜像）：后殖民批评预测概念悬空随参照消失而缓解；本文预测**悬空照常发生**，只是承担担保功能的镜像换成了另一个（前一代学者、隔壁学科、官方话语）。若无参照即无悬空，本文可并入后殖民批评。

附论二·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以下条目为编辑在增补附论一时核验，非作者原稿所引。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中层理论见导论第二章）

Chakrabarty, D.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